

响鼓重槌

张振涛音乐文集

张振涛

/ 著
Zhang Zhentao



凤凰文艺出版社
PHOENIX LITERATURE AND
PUBLISHING, LTD.

响鼓重槌

张振涛音乐文集

张振涛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响鼓重槌：张振涛音乐文集 / 张振涛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399-9703-2

I. ①响… II. ①张… III. ①音乐家一生平事迹—中国—现代②音乐—文集 IV. ①K825.76②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7693 号

书 名 响鼓重槌：张振涛音乐文集

著 者 张振涛

责 任 编 辑 刘洲原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703-2

定 价 5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响鼓重槌**音乐学家眼中的音乐学家**

其万折也必东——田青近年的行与思	7
呈师书——为曹本冶教授而作	20
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	32
不忍一生被这样抹去——《李元庆纪念文集》编后记	57
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他——怀念郭乃安先生	66
弦根——管平湖与中国音乐研究所	77
带火焦桐韵本悲——琴家王迪	107

中国音色

编列:明摆着的事儿	135
把“丝”这个字放回“丝竹”那个词	139
中西乐境分界点:十三	145
昂贵谱页——皇亲国戚对琴学的贡献	150
重审“有文化”	156

“物大于心”不如“心大于物”	163
什么人称“乐器”什么人称“家具”	166
电声乐器：无源之声、无本之乐	170
那次让耳朵生发意义的行走	173
十二月：终而复始的乡村纪年	176
大操大办与屡禁不止——一个前非遗时代和非遗时代的话题	180
声源与声援	185
乡愁的支点：乡音	188
压抑：给清唱一个理由	192
音乐辞典中的百年中国	195
三大地域音乐家群体的启示	198
一个农民与五万美金	201
乐种：一个重新启用的符号	205
二十一弦与二十四桥——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古筝比赛”观感	211
光耀丝竹——2013年国乐叙事	219
音流滚滚——七千小时录音与“世界的记忆”	226
个体表述中的集体记忆	238

他人的书 他人的谱

琴学至上——《琴学 60 年论文集》序	253
他的深度就是一个学科的深度 他的高度就是一个时代的高度——《杨荫浏全集》简介	259
两渠活泉 一塘云影——读田青《禅与乐》	268
一辈子做一件事 一件事做一辈子——《西安鼓乐全书》述评	272
捡起身边的金枝——周明《挫琴发展史及传承研究》序言	277
为乐班填写“起居注”——读刘红庆《向天而歌又十年》	282
家谱与乐谱——刘红庆《向天而歌》再版序	289
弦里弦外——《千曲晓声——卜大炜论文集》序	295
翻译的书与翻开的局——纪念《论各民族的音阶》翻译三十年	302
家乡的响器比想象的更响亮——肖文礼《岁时节日体系中的赣南客家仪式音乐研究》序	311
谱页——郭建勇《交响诗(力量的抗衡)总谱》序	323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1978 年以来出版物辑录序文	332
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 30 年	335
梦覆锦瑟	338
竽瑟狂会	342
崭新谱页	347

序言：响鼓重槌

下槌的起因

记得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时，站在复制的曾侯乙编钟前，手执近两米长的“濡木”，双眼盯住一束灯光下两千四百年前的成排编钟，重重撞了一下。当“濡木”撞击钟壁，轰然发出一声闷响时，不觉心跳有点儿加快，手心有点儿发潮。当年在湖北省博物馆任副馆长的冯先生指着钟壁上图画般的“钟铭”笑着问我：“能识几个字了？”“钟磬乐悬”的礼法威严，是从金属体冰冷冷的触感中让人体会到的。“对面王侯”自然是虚拟的“威慑源”，逼视冷目不复存在，但钟壁铭文依然让人感到主人构筑的“话语壁垒”的冷峻和威严。一个个金灿灿的铭文，不但两千年没有几个人读得懂，就是两千年前也没有几个人读得懂，因为它们构筑了一套方国宗族的话语，乐律学不过是整套知识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一旦“话语”与“权力”勾连，懂得话语的人就得在“秦灭六国”之际脑袋搬家。因为有这份知识储备的脑袋，对于渴望建立大一统帝王的秦始皇来说，可不是什么省心的“备份”。所以隔了两千四百年，这套“镂金版、刻钟鼎”的铭文，有三分之二谁也读不懂了。幸好，编钟的音响救了当代人。音乐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联手，靠千古不移的音阶规律，把谜一般的铭文读下来了。“钟磬乐悬”是建构礼乐制度的支撑物，吸引着学者们探下身来解读，但除了从事音乐古考的专家外，一般人难

有机会，手执“濡木”撞击“古代”。所以有此机会的人，就有责任把这份感受介绍出来。有关乐器的一组文章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类似介绍，慢慢积累，竟有十几篇了。

音乐学家的责任之一，如同科普作家一样，是要把有点玄乎的专业知识介绍给一般读者。国外大学教授都要求写一点普及文章，把最新知识转化为一般读者可以理解的知识。别小看这种文字，并不好写。学术论文可以不考虑读者对象，普及文章则必须考虑读者对象，所以科普读物写作难乎其难。“写出具有‘非小说’那样的‘可读性’而又不失学术水准的作品也非不可能，恐怕在今日中国还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①因此国外大学都要求一流教授做些极有挑战性的科普工作，这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责任。运用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与科普理念结合起来再以吸引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份观照古今、通俗易懂的文本——谁说音乐学家不需要文史素养与文学叙事的综合能力？

写这类文章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难成大事”的自知之明。构建理论体系，“犹河滨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②既然做不成大事，不妨做点普及工作。

王蒙写道：“韩少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就是想不清楚的事。”^③这些短文也是我想不清楚“大理论”却堵了一肚子感慨的结果。套用上面的话：想清楚了写论文，想不清楚写杂文。

写了几本书，空余下来，换换脑子，写点与学术不太一样的东西。音乐家渴望用文字描述音乐，虽然胜例罕见，但依然不断地写。舒羽《流水》中说：“用文字去巩固音乐，犹如用鞭子去抽打空气。”^④文字的功用在于抒发

① 罗志田：《变中前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读书》2015年第5期，第68页。

② (后汉)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五)，李培南、李学颖、高延年、钦本立、黄宇齐、龚炳孙标点整理，龚炳孙通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78页。

③ 王蒙：《从莫言获奖说起——王蒙先生在澳门大学的演讲》，《中国文化报》2012年11月26日第4版。

④ 江弱水：《流水观澜纪》，《读书》2014年第9期，第158页。

音乐家对音乐的感受和见解，不管是否说不说得清楚。

霜重鼓寒声不起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文字呈现方式上总有一种渴望采用异于日常口语、带点神圣和优雅去表达的意愿。推敲文字，提升意境，尽其神理，抵达境界。曹丕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文人自然有了“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的幻想。这些都在生长年代有意无意带给我们的作文标准。表达上能博雅并观，再好不过。正统观念培养的人，多多少少都希望文字能够通过内心自检。

一般来说，人们叹服的文字都是自然流出来的，行云流水，载云而成。有些人的文章，却是挤出来的。我属于挤出来的那种。我们的文字为什么不能像前辈那样“流出来”？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语言大都是由不怎么美也不怎么好的词汇构成的。流行语言不但不是令人生出美好情感的，而且是令人生出厌恶情绪的，生硬冰冷，枯燥乏味。上面说的那种人们喜欢的“自然流露”，像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范仲淹的散文以及《文选》和《古文观止》的那类文章，都以传统文化语境为背景。远了不说，就说前几代人的流露，都是“读书破万卷”后的流露，是以“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宋词元曲”打底子的流露。从小背书，背了半辈子，一肚子，到了一定年龄，文字出来自然如涓涓流水。我们从小背了些什么？不是“语录”就是“社论”，灌进脑子里的口号变不成隽永文字。这种积累对于写作非但没好处反而只有坏处。这让我们不能也不敢“自然流露”。不经过加工就不成体统。所以我们的“自然流露”，或者说未经加工的语言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这就是教育残缺的我们天生不足而极力渴望后天弥补的。不是不想“自然流露”，而是不能“自然流露”。“流露”就是“露馅”！这也是我作文时不得不一遍遍写、一遍遍改的原因。

写《包法利夫人》的法国作家福楼拜，据说写作速度非常慢，每天像蜗

牛一样写很少的字，改来改去，直至满意为止。亚当·斯密说：“我是一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够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①读到这类记述，稍感宽慰，知道世界上还有像我一样的人。虽不敢妄比前贤，然一遍遍写一遍遍改，“一诗千改心始安。”过去曾是质量为数量让步，换来身份和荣耀，现在却是数量为质量让步，获得经得起内心检验的安慰。

年轻时作文，总想拿去赶快发表，享受“成就”感，但拿到刊物就发现了一堆毛病，于是止不住再改。加入学术圈，觉得必须发表足够的文章才能慢慢翘起学术天平另一端的评价砝码。记得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是在1984年《中国音乐学》。我到新源里西一楼的编辑部校稿，心里扑腾扑腾乱跳，可见对发表文章多么重视。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了得吗！现在想想真是幼稚，但在当年真当回事儿。那时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不同了，发表文章，越来越掂量是否能够经得住推敲。老师黄翔鹏教导我，最好把刚写完的文章放在一边，直到因为一个时期不断琢磨而提升的温度平息下来，才能看清哪里有毛病，再改正才能稍近满意。

顾炎武说：“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②知道此理，后悔因为年轻而没有控制住。所以虽然文章发表了，还是止不住完善。一遍遍看，一遍遍改。因此现在呈现的文字大都是发表后又经过了一轮轮加工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我想把家收拾得像个样。

每个人都渴望把自己的鼓，敲出响遏行云的动静来，但时代让你的鼓面或绷紧或松弛，动静的大小，由此而定。“霜重鼓寒声不起。”响鼓重槌是一种追求，做得到做不到则是蒙着鼓皮的共鸣体“鼓腔”使然了。不管有没有那么大的响声，毕竟是一个时代的动静。

^① 罗卫东：《亚当·斯密的启蒙困境》，《读书》2010年第12期，第26页。

^②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著书之难》（中），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4页。

音乐学家眼中的音乐学家

其万折也必东

——田青近年的行与思

我接触的人中，大部分都能想象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但有两个人，你无法预测下一步他会做什么，一个是黄翔鹏，一个是田青。他们都是拥有这个时代相当稀缺的思想和独特品质因而能够从心灵层面摆脱陈规并活在身边的真实的人。他们的文章总是出人意外，“笔落惊风雨，语出泣鬼神。”（杜甫）提出的见解也总是令人警醒，对待国家整个文化事业和音乐学事业，不但能够从大处高屋建瓴、提出非同寻常的见解，并且总以其出手不凡的实践，影响一大批人。生命力和创造力旺盛的人，就是不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的人。



参与非遗实践

21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出现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始起，概念莫明，机制莫筹，天下扰攘。这时，社会需要一批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辨析名称，阐释义理，进而推动政府制定长策。于是，冯骥才、乌丙安、刘魁立、资华筠、刘锡诚、田青等一大批学者，聚集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非遗代表作名录”的实施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周围，召开会议，撰写文章，设坛宣讲，编撰书刊，举办展览，组织演出，先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再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更立“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后置“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数年之间，大政格局，建构完成。四级名录，巍然而立。上有国家级，中有省市级，下有区县级，分层设立，渐成纲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设立再起波澜，“非遗法”出台，顺风顺水。国家体制在此范围内相当有效，文化部完成顶层设计，一系列机构相继设立。工作千头万绪，都需能兵强将。田青主当其位，任“国家非遗中心”副主任，成为共掌大局的核心人物，不但为此项事业的推动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为核心理念的梳理提供了思想资源。面对大事、盛事，应对急事、难事，他身做柱石，当一面重任，展现出非凡的专业智慧和组织能力。

一个人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一定遇到适合发挥自己专长的机遇，所谓有识者未必逢其时，当时者未必有其识。田青幸运，遇到了最大程度发挥才干的“非遗”时代，储备了大半辈子的知识，一股脑派上了用场。人逢其时，器逢其用。实在说来，没有比他更合适这一位置的人了。

田青于21世纪所写的文章和排得满满的讲演，一个突出主题，就是把“五四”时期被打翻在地并于“文革”期间“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传统文化”，重新扶至国家殿堂，把琴学、昆曲、原生态民歌以及在科学名义下被“污名化”并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的古老乐种，于触底的危境，反推至正席。把

遗产作为又一次力挽文化失重的载体，承载当下国人的心灵重托，成为渴望文化复兴的大国在经济崛起之外的另一支点。正如学术界评价的，“非遗”的意义就在于把贯穿于从“五四”到“文革”整整一个世纪对传统的批判彻底翻转过来，不但正名正义，而且合理合法。

他的一系列有关该主题的阐说，都成为 21 世纪初期学术视野上令人感到沉重、也令人愿意放慢脚步停下来细细聆听和思索的话题。无疑，这是他近年来演讲论说和奋笔疾书最具看点的部分。这一重大的社会事件成为他思想和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若没有一次次会议迫使他站在台前、迅速反馈、立刻阐述一番道理的需求，就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思考并把大半生的“前积累”融会贯通的机缘。问题一起涌来，一下子摊到了一张巨大的桌面上。翻来覆去的讲演与书写，使他的思考日益缜密。如何衔接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如何把过去的批判对象变为被去弊、被扶正的历史资源，以及实践中保护传统音乐的可操作性等问题，都被他采用新的参照坐标加以重新梳理，许多老说法因之而焕然一新。频密的社会事件客观上催促了他，让站在现场于第一时间解答当代人困惑的主持者，迅速做出与学者身份相对应并足以使当代人满意的反馈。他明白，自己的努力就是力图对百年社会转型造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抬不起头来的状况进行辨析和澄清。与此同时，国学复兴、文化生态保护区、古村落保护等一系列社会关切，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命题恰恰是他一直渴望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于是，打通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壁垒，使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空前高涨。人生阅历和思想成熟期恰恰赶上重大社会事件的需求，使他在近十几年，学开新境，迈进了“正常年景”难得一遇的一片金色秋景之中。

听听他的积累吧。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

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①

一次会议上，他一字不差地脱口背出一大段鲁迅的话，首尾近百字，诵之如滚瓜，当时确实把大家惊着了。话不算短，若无早年积累，绝难吐纳吉珠。厚积之水，堪负大舟。

涉及全国各行业的大规模文化复兴运动，理念来自联合国，推力来自政府，行为来自学者。学者成就了非遗，非遗也成就了学者，使其积累获得了从新的意义上阐述的空间，发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政府渴望用通俗形式把刚起步的“非遗”理念普及到百姓，田青以自己的智慧，找到了方法，让模模糊糊的“非遗”概念溢出书面，进入大家的理解现场，这个创意让主管该领域的政府官员美得不行。作为“暴风眼”中的人物，人们从他的阐述中找到了内心映照，对待传统的态度慢慢恢复常温，进入政府和民间的生活和操作系统。在中国，行政职位就是学术地位，学术话语就是权威话语。田青“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②。

国 嘴

看田青书的人不如听他讲演的人多，对于学者来说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但这个时代，大家的确更愿意不费气力地接受新理念，比起阅读来，更愿意听讲演。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培养讲演也不擅长讲演的国度，具有如此能力的人，十分罕见。以讲演名世也以讲演折腰终于还是以讲演获誉的人，以征服千万听众的魅力，独享“非遗”鼓吹者的桂冠，最典型的就是文化部于“文化遗产日”期间主办的一系列非遗项目展演。来自各地的非职业

^①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引自田青：《非物质文化保护三议》，《捡起金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② (宋)范晔撰：《后汉书·冯异传》(三)，北京：中华书局，第648页。

演员,在他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在极短时间内推出了几台大型节目,当时还很不被城市人看好的品种,若无他充满学术品位和生动智慧的主持,就会减色几成。大部分人不了解节目意义,没有解说,效果截然不同。他主持的包括昆曲、古琴在内的音乐会,解释角度新颖,既风趣又不说教。脱口而出的机智,魅力不凡,许多话简直可以做标题。“昆曲等了你六百年,不差三十年。”这类风趣也沉重的话,马上成了流行语和标志口号。

美国作家阿瑟·克里斯托(Arthur Krystal)说:“一句说得很巧妙的话可能只是因为巧妙才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的类比精确有力,感染力很强。诗词曲赋,典故民谚,左右逢源,触境生春。

《旧唐书·马周传》说:

吾见马(周)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字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苏(秦)、张(仪)、终(军)、贾(谊),正应此儿。^①

以此转赠田青,大致不差。江湖之上,可以轻松放言,庙堂之上,却须拿捏分寸。万众瞩目,高官莅临,出口成章,终不逾矩,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到日本的“破冰之旅”,带领“非遗”演出团演出“守望家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晚会”,两国领导人台下就座。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田青的“国嘴”真得是代表国家。

许多场合,他以智慧化解了危机。台湾“汉字文化节”开幕式上,台湾学者发言道:“你们总说两岸团结,可我在大陆看电视,打开一个频道是解放军打国民党,换一个频道还是,再换一个还是。到处传播仇恨,哪有半点

^①(宋)欧阳修撰:《旧唐书·马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19页。